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

——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张晓唯 著



主编 刘泽华
中国
社会
史
研究
丛

与
中
国
社
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主编 刘泽华

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

——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张晓唯 著

K825.4 / 14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元培与胡适 (1917—1937): 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张晓唯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刘泽华主编)

ISBN 7-300-05064-6/C·234

I. 蔡…

II. 张…

III. ①蔡元培 (1868—1940) - 人物研究②胡适 (1891—1962) - 人物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1845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主编 刘泽华
蔡元培与胡适 (1917—1937)
——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张晓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9.5 插页 2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5 000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刘泽华

20 世纪末，经专家评议和教育部核准，南开大学组建了“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它是教育部在全国高校建立的百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当时确定了两个重大研究课题，其中之一便是“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这套书就是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在三年的时间里，参加课题的同仁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得的成果是否合格，这需要由读者来评判。

我在这个序中简单说四个问题。

一是提出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初衷问题。

应该说，思想与社会互动不是一个新问题，无论哪种流派都会程度不同地给予关照。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阶级分析最为盛行，无论什么思想都要分析出它的阶级性及其社会意义。对这种做法大家后来有些倒胃口。随着改革开放与学术环境的变迁，学术风气有了很大变化，多数人向专门化发展，研究思想的只注重思想逻辑；研究社会的大抵限于问题的本身，与思想无大干系。有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要加强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我们提出“互动”有如下几层意思：其一是针对时下学界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不搭界的现象而提出的；其二在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与社会决定思想有别，又要与思想决定社会有别，我们所强调的是：思想与社会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三是强调思想与社会的汇通关系，在这里作为关键词的“思想”不宜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领域，思想关联着特定的语境（社会）；同样，作为关键词的“社会”也不是与思想分隔的，而是思





想文化建构的结果。在南开大学举办的“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上，庞朴先生有一段更凝练的概括，我引述于下：“照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不能将思想与社会视同两截，不仅要二者互相关联，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思想当作观念化了的社会、将社会当作物质化了的思想来看待，来研究，来说明。这样的研究，将既不属于社会史，也不属于思想史；既可视思想史，也可视为社会史。准确地说，它是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具体点说，它将注意于社会的思想（观念）化和思想的社会（物质）化的形态、过程、现象、问题等等的研究。”

问题提出来了，在研究中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如果有人问，你们做得如何？我只能说：仅仅是开了个头。

二是选题的思路。

本套丛书的每本书各有自己的主题，但又都沿着“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这个大思路展开自己的触角。大致说来我们是沿着以下的思路来设计选题的：1. 政治哲学问题；2. 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文化范式；3. 政治理念的社会化问题；4. 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5. 人物的政治理念与行为。

每本书虽不是按题作答，但大体说来，各侧重一个问题来进行论述。

三是关于课题成员的组合问题。

从书名上看，一望可知，这套丛书每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更谈不上有机的构成，而是一个拼盘。这个盘子就是“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如果为了某种完美，比如历史的系统性，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写出一卷或多卷本通史，但这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做学问宜于“接着做”，不宜“跳着做”，因此我聘请人加盟，首先考虑的是他们前期在做什么，能否与课题联系起来“接着做”？因此加盟的作者，除了几位年轻的博士外，都是胸有成竹之士。基于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手法，以发



挥作者的专长。每本书之间尽管没有直接的关联，但都围绕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这个主题来展示自己的个性。

四是关于研究方法问题。

一定政治理念的形成是社会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当我们说综合的时候，决不排除社会阶级、阶层和特定身份的内容，但我们的意思也很清楚，它又不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特定身份的直接的对应物。比如说本丛书中有一本《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帝王观念就是社会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依照我们多年以前习惯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剥削阶级的意识与观念，毫无疑问，至今我们仍认为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有其不可颠破的合理性内核，但如果仅仅如此，显然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帝王观念不仅仅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同时又是整个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各阶级、阶层、个人在主流上都认同帝王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归宿除了走向帝王体制，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于是，我把上述观察问题的方法概括为“阶级—共同体分析法”。当我们用“阶级—共同体分析法”来看待各种政治理念时，我们既想打破习惯的阶级分析法的狭隘性和直线性，但又要保留它的合理性内核；我们既想吸取社会分析法，又想避免只谈社会不谈阶级的泛泛性。时下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状态，这自有其道理，但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淡化或抛开了合理的阶级分析。对此，人们的看法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创造性地、适度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参加丛书撰写的同仁们未必在理论上都同意我这个概括，但我这个概括是容纳诸位同仁的个性的。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2003年6月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目 录

绪 论 五四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1)
一	(1)
二	(3)
三	(6)
四	(21)
五	(23)
 第一章 蔡元培、胡适交谊综论	(25)
一、北大共事(上)	(25)
二、北大共事(下)	(41)
三、沪上合作	(58)
四、南北睽隔	(75)
 第二章 文化思想之异同	(87)
一、两代人同一主题	(87)
二、立足“传统”	(104)
三、趋向西化	(113)
 第三章 教育独立之梦	(123)
一、偏重大学教育	(123)
二、在学生运动的旋涡中	(139)
三、教育独立之梦	(149)





第四章 红学之争	(160)
一、《石头记索隐》	(160)
二、《红楼梦考证》	(168)
三、治学平议	(180)
第五章 政治情结	(189)
一、亦学亦政	(189)
二、自由主义之累	(201)
三、落寞晚暮	(216)
第六章 人际交游与做人风范	(229)
一、两个相互重叠的人际交往圈	(229)
二、从北京大学到中央研究院的人事变迁	(244)
三、一代人师，两样风范	(258)
余 论 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	(273)
一	(273)
二	(279)
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295)

绪 论

五四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



发生于 80 年前的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次知识分子运动。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成员为主体的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知识分子，在短短数年间，以其震撼力极强的激扬文字，传播新知，评判旧学，启蒙思智，重塑典范，影响一代青年至深至巨，近代中国的价值系统、政治文化和学术理路自此为之一变。这是一批在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文化领域锐意兴革，甚为活跃，颇具影响的新文化培育者，我们谓之五四文化人。^①

就价值倾向和合作方式而言，五四文化人带有明显的群体

① 此一概念，并非泛指“五四”前后脱颖而出的文化人士，而是专谓造就了“五四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近年学术界不乏使用此概念者，但多流于模糊表述，外延不甚明确，易生误解。故特作限定，以便于论述。



活动特征。他们基本上供职于北大，自沪北迁的《新青年》杂志因而几乎成为同人刊物，每每论及某一问题，往往此呼彼应，互为声援，甚而扮演双簧，引动视听。他们对于西方的人文学说及东方固有文化大体取一致或相近的态度，从而在当时形成一股流派和势力。然而，五四文化人聚拢的时日甚为短暂，自1917年始的二三年间是他们洽契合作的黄金期；五四运动之后，彼此歧异日益显现，新文化阵营呈分化之势。经过20年代初及中期的《新青年》南迁改组和“女师风潮”等事件，以及种种人事变迁，至南方国民党兴起、社会政治形态再度集权整合，耸动一时的五四文化人群体已基本消散，其原初影响力日渐式微。

陈独秀最先游离出来，由文化人的激进主干异变为不甚胜任的政党魁首，其悲剧命运由此铸就。刘半农、钱玄同这两位猛将亦迅即沉寂下来，或远走欧洲提升学历，或踱入书房深研古学，折入学人一途。崇拜俄国革命的李大钊，将社会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合二而一，以学者兼革命家的身份为理想而捐躯，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批殉道者之一。四川省那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则“渐入颓唐”，深陷堕落实而难以自拔。鲁迅、周作人兄弟长期雄踞文坛，其个性鲜明的文章，或辛辣深刻，或闲适平和，均能赓续启蒙思路而风行海内；不过，其兄始终未脱“魏晋风骨”，晚岁虽号为左翼旗帜，而其本质仍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其弟则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塔，一直在“出世”和“入世”间徘徊，枉自清高一世，却在昏然“下水”后饮恨余生……周氏兄弟所显露出的性情与现实难以融合的共性，颇堪玩味。此外，如陶孟和、沈尹默及傅斯年、罗家伦者流，其后大抵安于文教一隅，非复有当年的风发意气。特别值得关注者，是蔡元培、胡适二位，他们联手合作绵延20年之久，隐然成为民国知识界的主导力量，又均保持着当年的启蒙意绪，使五四文化人的余脉得以延续。



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尝试新诗创作、宣扬个性解放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等骄人成绩蜚声海内外，堪称五四文化人的典范。而蔡元培的情况则略显特殊。他虽像大多数五四文化人一样，具有为时不短的国外求学经历，却有着为他们所不具备的清末翰林身份和民初入阁参政的生涯，其学术和政治地位均非同寻常。在倡扬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他没有陈独秀、胡适等人那种锋芒毕露的震动效应，却在实际上催发和护持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震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革，其意义并不亚于《新青年》的启蒙，就实际情形而言，“五四”当年，北大的革新所产生的辐射力具有更直接可感的社会影响。被后人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历经浮沉、痛自反思的晚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 由此可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的作用十分重要，亦颇为特殊。



二

蔡元培与胡适自 1917 年在北大结识，至 1937 年抗战爆发而天各一方、交往断绝，其间整整 20 年间，合作洽契，过从颇密，关系非同恒泛。二人共同效命北大时期，胡适得蔡元培赏识和扶掖，顺捷跻身文教上层，而蔡元培凭依胡适等欧美派力量刷新校政，锐意“西化”；二人一为校长，一为教务长，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时代合力苦撑教育残局，常能不谋而合，默契共

^① 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载《中央日报》，1940-03-24。



事；面对南北分治、政治动荡的局面，二人联手提出时局主张，共同寄望于“好人政府”，一时均为北大“清流议政”的头面人物。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蔡元培、胡适的政治处境形式上虽不尽一致，然在社会政治形态由相对宽松到重新集权整合的演化过程中，本质上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内心均交替经历了调适—抗争—再调适的复杂过程，共同表现出某种“不适应症”；20年代末，二人在沪比邻而居数年之久，曾一同在大学院大学委员会、上海中国公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机构中共事，依旧合作如初；30年代初，胡适复归北大，二人始两地睽隔，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等方面的活动，仍将彼此联结在一起……遍观五四文化人，像蔡元培、胡适这样交往时日之长、交谊程度之深者，确乎鲜见。

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这一“蔡元培、胡适联结现象”，已远远超出个人往还的意义，而具有多重社会内涵。

其一，由于蔡元培、胡适二人均有甚高的社会、学术地位，他们之间的彼此推重及联手合作，很自然即形成知识界的一股主导力量，这可从他们相继主持权威性教科文化机构的事实中得到印证。继蔡氏出长北大之后，除奉系势力短时控制北方、改组北大之外，这所著名学府的校务基本即由蒋梦麟、胡适先后主持，李石曾的“中法系”曾试图涉足其中，结果引发风潮，大败而归。蒋梦麟、胡适乃蔡元培当年在北大时所倚重的左右帮手，他们一脉相承地治理北大，风格虽不尽相同，其自由学风却并无二致。蔡元培晚年一直主持中央研究院，其逝世后，继任院长人选以胡适的呼声最高，因胡适担任战时驻美大使，有外交重任在身，院长一职遂由他人代行，直至50年代胡适终于荣任“院长”一职，其前因后果，并非偶然。民国时期甚有实力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着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与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蔡元培、胡适分任董事长和董事，是该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关键人物；相当数量的学校、院



所和人员曾受益于此。显然，蔡元培、胡适在学界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

其二，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元培是戊戌年间康、梁一辈人，虽成名颇早，然其功业顶峰却延后至五四时期，这得益于他颇能与时俱进。与蔡元培相类者，有张元济诸人。胡适则是科举制废除后有幸亲炙欧美教育，学成归国的一代新人。从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上，他们之间颇有差异，20年代初蔡元培、胡适之间围绕小说《红楼梦》展开的学术争论，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蔡氏与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的长期合作，沟通了戊戌至“五四”的两代人，透露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虽瞬息万变，而思想文化使命则相对专一的有趣现象。考察蔡元培、胡适交谊的社会内涵，对于深入索解清末民初的时代主线将不无助益。

其三，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无论在当时或其后均屡遭物议。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兴起后，更进而试图全面否定五四精神，国民党内一些大员亦不时兴风作浪，诋毁新文化，欲谋复旧。蔡元培、胡适作为“五四”当年的领军人物，彼此联结，构成一道护持五四精华的屏障，至少在他们可以左右局面的教科文机构和知识分子圈内，依然保存着蔑视偶像、自由探索、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五四风范，从而使五四文化人当年种种热诚努力所得的成果免遭销蚀殆尽的厄运。

蔡元培和胡适均属近代教育文化史上的大家，他们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名异而实同的思想主张，在教育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创见及承续关联，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的共同追求和不同处境心态，以及在学术志趣、品格修养和人际交游诸层面的异同比较，都值得加以认真探讨。而他们的交谊始末及其对民国教育、文化和知识界的多方面连带影响，更为追踪研究五四文化人的后续发展及活动提供了颇为典型的案例。所有这些，庶几构成一个颇具研讨价值的“近代学案”。



三

蔡元培和胡适在“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分野中的归属及定位十分引人关注。就他们各自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观察，应当属于“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所谓中国式自由主义，表面上似乎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更多呈现宽泛和包容的特点。不过，他们的政治文化诉求很难用齐一的声调表达，总是在基本指向大致确定的情形下，追求自由、科学和民主的终极价值及现实功能，并力求使这种追求的效果最大化。同时，抱持自由主义理念、固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们往往是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其人文色彩比较浓厚，带有明显的“观念人”的特性。尤为有趣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信徒”与早先的“士大夫”群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渊源，“自由主义”的一些精髓同样能够在中国典籍中找到思想理念的相类部分，毫无疑问，古典形态的自由风骨在中华文化中显然是存在其学理资源的。

进一步言之，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其天性而言，本来就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化倾向，这是转型社会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和他们对于新知识新技能的“本能”追求，使得其不断地向社会多元和人格独立自主方面发展，因而在意识和理念上亲和民主机制，乐于看到绝对权威的淡化，而对来自权力系统的高压控制常常产生排拒心理。正是这部分带有自由倾向的知识界成员，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局面，显得比较主动，也更能迎合新的政治理念，并向社会其他公众传播和宣传。当然，在出现来势凶猛的权威高压态势时，这部分知识分子也会出现明显的分化甚至退化，可是一



旦事过境迁，其大部分仍会回归自由理性，恢复原初常态。

表面上看，自由主义在中国不像其他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那样真的能够“开花结果”，留下若干可触可感的历史遗物，而是更像某种虚无缥缈的薄雾弥散世间，使人们久居其中而不觉其臭。尽管长期以来对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诠释和评价相当混杂，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即一般的流行认知之外总会存在一些“真空地带”，它的特性表现为反向思维和“脱轨行为”，因而与主流的价值学说和习以为常的认同本体之间时时大相违异，以至经常成为手握权柄者必欲清除的病毒夙敌，沦为“弱势”存在也就在所难免。但是，自由主义具有极强的韧性生命力，几经摧折，却活力依然，既反映出人的本性中不易舍弃的因子，也透露了社会变革的某种根本诉求。

当然，中国的自由主义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经济因素的有力支撑，或者说，与这方面的政治活动脱节严重，故而不得不流于文人学者“笔政”中的一项经常性内容，却很难见到真正有规模的自由主义政治运作。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本能认同，不如说是一种生存原生态，只要他尚属于自由知识群体，便会依循其固有的理念和逻辑行事，直至碰壁后被迫做出调整和改变。应当看到，具有自由主义性格的知识分子，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思想文化，同时也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精神追求。并非每个有机会接触西方人文思想的人均能成为诚笃的自由主义者，但奉行此一理念的人必定高度认同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虽然不排除也有些许中国传统文人的狂放清高和浪漫成分蕴涵其间。中国的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之间显然有着天然连接，相当数量的文化人躬身奉行，并向其他社会阶层传播，尤其是在他们尚未与权力发生亲密接触，尚不知此中奥妙时更是如此。

很明显，在以往历史中，自由主义往往不见容于权力支配者。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首先，支配权力追求整齐划一，强



调集体行为，视过于个性化的举动为有害，故只能成为整肃对象；其次，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实质上是要分权，是要通过监督限制权力支配者的“自由权力意志”，甚而通过体现民意；剥夺或部分剥夺强权者的支配力，因而自然被当做危险势力而要着力加以剿灭；其三，自由主义思想理念就本质而言，是属于理性的，对于激进民族情绪和统治者有意塑造的旨在强化政治秩序的诸种理论说辞，则多少有着削弱甚至颠覆的作用，在此条件下必然不能给予生存空间，必须打压之，排斥之，视为洪水猛兽。尤其当权力的取得形式比较简单，或者权力的基础已不甚牢固时，权力支配者与带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势力几乎难以有共处的兴趣和转圜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是说，权力拥有者与自由主义之间毫无合作可言，但那必定是在比较独特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



前文提到自由主义在中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带有较大的包容性，实际反映了自由主义的理论色彩相对薄弱。多少年来中国虽不乏思想家和理论人物，但在系统的理论建树方面，并未给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扩充更大空间，也未能真的实现将这类外国舶来品本土化。然而，这绝不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难以流行开来，缺乏存活和生长的土壤。恰恰相反，越是稀缺越显示出其价值，越觉得迫切需要，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诉求。当年，胡适一批自我标榜为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相交的一个阶段，颇能显示他们的自觉意识，其内涵多少带有与国民党政权尚未“磨合”的状态。不过，从中也感到胡适一班人还是存留了相当的“独立意识”，其内心还有某种莫名的优越感。到后来，自由主义的旗帜虽然被不同的党派所挥舞，但那不过是作为一种斗争工具罢了，面对激烈对垒的格局，即使刚刚“出道”的青年大概也不真的相信所谓自由主义的漂亮说辞了。在一片对理想社会的热烈憧憬当中，自由主义似乎不得不滚落到角落里。50年代初，胡适博士利用



他短暂的访台机会，更起劲地高唱起自由主义的颂歌，其用意实际上也是将一种信仰变成了斗争工具，参与到政治对抗之中。在此过程中，胡适有意树立起一个偶像，那就是蔡元培。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学界开始了思想改造，批判自由主义已成题中应有之义。正当此时，胡适在海外迭次发表演说，高扬当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并冠以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明显带有思想抗争的意味。应当说，当时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和理会胡适的已经明显“落伍”的一套说教。但是，他无疑留下了一个严肃的思考课题，自由主义的精华部分后人如何发扬光大？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之后，人们才在回首往事的反省中重新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某些现实合理性，以及其可贵的一点历史资源，从而对包括蔡元培、胡适在内的近代人物的思想遗产做二次开发，力求从中得到可资借鉴的智慧和捷径，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严格意义上说，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者在近代中国波谲云诡的社会环境下，是极难生存的。后人可以赋予某一历史人物这样那样的属性，或从其身上找到所需要的种种品质和傲骨，但毕竟主观色彩过浓，尚难以让世人接受。倒是确乎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在其一生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树立起自由主义旗帜，并确乎既提出了思想主张，又有令世人印象深刻的实践。如果由后人来确定 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肯定地讲，蔡元培、胡适是堪当这一“荣誉”的。显然，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已深深刻入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而他们与“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思想多元化局面的生成均有着不可替代的关系。其实，就一个人的一生作全面考察，具体结论与所谓时代“定论”之间会有颇大的距离，倘若简单强调某方面，认知偏差便难以克服。在此，我们重视的是主色调，即比较本质的内涵。

胡适的自由主义定位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他一生在言论方